

国际社会的历史演变 及其对金砖国家文化教育战略基础 ——区域国际关系体系形成的影响

[俄]阿·沃斯克列先斯基
许宏 孙名蕊 编译

摘要 20世纪初,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体制开始形成。二战结束后,摆脱了殖民统治的亚洲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从世界上兴盛的两种欧洲现代化发展模式中选择其一。旧的经济结构模式实际上在20世纪末完全消失。那些采用西方市场经济竞争模式,却在其中融入本国特点的非西方国家制定了自己的现代化方案,并在某些方面开始赶上世界体系中的领先国家(“追赶型”发展模式),甚至还有一些国家尝试推翻西方后工业时期的发展模式。由此形成了当今发展模式高度竞争的国际环境。这就要求通过政治精英的“责任国际化”来培养新一代的专业人才。金砖国家联盟的创建及成员国的协同发展——这是实现成员国共同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关键词 国际社会 区域国际关系体系 发展模式 政治精英 教育

Voskressenski.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Sub-Syste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Basis of 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trategy of BRICS Countries

A. Voskressenski

Trans. Xu Hong Sun Mingrui

Abstract The main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were formed on the eve of the 20th Centur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decolonizing and modernizing Asia chose between two versions of Europea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Each of them went through turbulent transformation at the second part of 20th Century and the mainstream model of development within the old technological stage was exhausted. Successful Non-Western countries based their way of development on the Western model of market economy but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put forward their own models of modernization managing to economically “catch up” leaders. Some even challenged the Western mode of post-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us the modern global model of high competition in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was created. This model requir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 new generation of professionals through “responsibl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uture political elite. The creation of BRICS bloc is a new sta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ultural-educational strateg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ociety ; regional sub-syste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models of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political elite in BRICS countries

若对东方进行整体描述,则大致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这里都处于被殖民的世界边缘地带。当时世界体系的主导者是欧洲(经济与政治两方面)和美国(19世纪末开始经济上居主导地位,而20世纪初开始不仅经济,政治上也逐渐开始占居主导地位)。从19世纪末起美国经济领导力不断提升,其世界政治的参与力也由弱变强,至20世纪上半叶中旬,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领导地位愈发突出(伍德罗·威尔逊与他的国际联盟方案)。由于美国领土并未受到毁灭性的二战的破坏,日益强大的美国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最终促使美国从霸权国家转变为举世公认的世界两极体系结束阶段的经济、政治、军事领袖。在整个20世纪,欧洲区一直都处于世界政治的中心,世界的命运被其主宰。而18世纪末到20世纪末,东方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配角,它一直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但形成并实施于东方的“殖民主义”现代化模式开始逐渐转变成农业市场经济模式和威权政治模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一世界大区域中开始了一系列重要运动,这些运动使得“亚洲觉醒时代”真正来临,并为东方进入“非殖民化与政治现代化”的下一阶段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前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原型(如中国满清、伊斯兰、希腊、罗马、中世纪欧洲)的构成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始形成的现代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并不相同。这一新体系形成的统一原则是建立在不断发展的欧洲规则(对法律地位平等的国际社会成员国开放的体系)的基础上,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国家主权的平等,但直至19世纪末等级制度才完全被废除)签订后开始成形。在这个体系里,俄罗斯(其皇室及绝大部分贵族与欧洲有着亲属关系与文化渊源)在经历了欧洲战场上的血战与彼得的现代化后,成为了具有平等主权的该体系中的一员。然而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开始扮演愈来愈保守的“欧洲宪兵”角色。^①对俄罗斯来说,地理上与欧洲的毗邻弥补了俄罗斯对内对外政策的保守,实际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与俄罗斯皇室及俄罗斯

大部分政治精英有着血缘关系。然而随着沙皇一家悲剧性的死亡与白卫军在国内战争中的失败,亲属关系随之中断。而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时期,强制性的精英“民族化”,和全世界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苏联式的强制性的封闭最终导致经济和意识形态上“闭关锁国”的“发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形成。但这一模式的高效性及竞争力最终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20世纪初,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体制开始形成。此前存在的那些非欧体系实际上是互不相关的区域性体系,这些区域性体系的结构不同于欧洲体系,它们或者是霸权体系,或者是帝国体系(如中国满清体系、伊斯兰体系)。这种区域性体系的中心是存在一个最高统治者,其代表最高权力中心。而其他都可视为边缘区,边缘区里可以有一些地区性自治组织,或者事实上的独立国家。然而即使是独立国家在这些以非欧标准建立的非西方区域性体系中(如中国满清体系、伊斯兰体系)大体上也是不平等的,也就是说,这些独立国家比核心国家发展得要略慢,或者即便事实上不慢,但至少这些国家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最为有趣且重要的一点是,即使按照和约来调控这些非欧区域体系中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它们依然不会“平等”——这就是等级制度,即使是与“边缘”国家签署协议(所谓的“联姻和约”,“父道主义协议”或者“兄弟协定”)也是如此。这种体系以“上升——稳定——停滞——下降——危机或瓦解”这样的循环演变并交织着变革直到19世纪末。这种体系发展的巅峰时期是“东方式”的政治与经济循环的农业市场专制帝国模式(如奥斯曼帝国和清朝)。19世纪初,这一模式开始急剧地由盛转衰,其首要的原因是技术和生产的落后。^[1]

尽管现在人们或多或少对世界及其历史

^①详见以下书籍:Систем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4-х т. Под ред. А. Д. Богатурова. М.: 2006; <http://www.obraforum.ru>; Богатуров А. Д. (Отв. ред.)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9; Восток / Запад: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одсистемы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вузов / под ред.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ГИМО(У) МИД России. М.: РОССПЭН, 2002.

演变过程、全球统一政策与世界统一体系有一定认知,但 19 世纪前,这些现代意义上的观念都不存在^①,存在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并不相关,只部分相交叉的区域性文明世界体系(如:欧洲体系原型,伊斯兰体系,中国满清体系等)。它们之中最通用、最开放、最有价值的要属欧洲体系,其普遍性的特点对国际社会中的各成员组织具有极大的吸引力。^[2]此外,欧洲体系的吸引力还在于它是在快速发展的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现代生活方式也是以此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19 世纪初,在欧洲传统中“平等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这一观念开始形成,到了 20 世纪中期,这一观念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充。人们认为,国际社会中的这些平等国家都将或快或慢地建立起一种体制,该体制下人民能够公平、完全地参与国家的管理(社会政治领域对民众开放的民主国家)。此外,人们还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现代化观念,这种现代化的基础是有意识地大规模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将可改变全球技术格局的科学发现走上商业化运作道路。^[3]

这些观念也形成了现代人类的社会面貌。20 世纪初出现的现代世界体系原型是以欧洲模式为基础创建的,这一原型促使了“现代国际法”这一观念的形成。现代国际法在法律上确认了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推动国家与民族观念的形成。这些观念正是在欧洲,而非其他(如中国满清、伊斯兰、非洲、拉丁美洲)传统模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们同经济因素一样,对于整个世界体系(包括边缘区)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就形成了国际社会与世界体系现代意义上的理解。整体来说,这种欧洲式的体系是开放式的,一些边缘国家,可以逐渐加入进来,比如亚非国家。这些竞争力不是很强的亚非国家早些时候或者曾加入过其他非欧洲等级体系,或者曾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加入过欧洲体系。这些国家接受国家间相互交往的准则(欧洲体系构架的基础),加入欧洲体系,并效仿欧洲体系进行本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个现代化是依赖式的、追赶式的,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也是服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的。许多东方国家由

于与西方存在差异,且这些东方国家自身比较贫穷,没有西方国家的优势,因此,被提上日程的可供选择的现代化道路为在西方国家首先制定出的,但在那里并没有被普遍采用(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他理论)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依据非西方的苏联动员型发展经验建立的适用于其它地域社会政治现实的现代化道路。

欧洲国际体系核心的开放性特点以及对极权国家的抉择显然在 20 世纪下半叶引发了对国际体系内部成员国开放政治社会体系的可能性,而后又是必要性的思考。正是在左右两翼的极权选择的争论中生出了需用军事力量(如果需要的话)来维护这一体系的思想,而该军事力量的使用在开放的政治社会体系中需由人民选择的国家政权来掌控,国家武装组织需要绝对服从该政权。

二战后,脱离了殖民统治开始现代化进程的亚洲面临着从世界上兴盛的两种欧洲现代化发展模式中选择一的问题。一种是建立在“动员——稳定/停滞——系统危机/政治冰冻——政治解冻”循环交替基础上的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如苏联模式);另一种是以自我组织与经济政治竞争为基础的民主市场模式(如美国与西欧模式)。^[4]二战时期,为对抗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极权侵略由参战国组成的同盟国联盟主要是个军事性联盟,二战结束后,该联盟解散,这在事实上促成了两极体系的形成。然而,尽管在两极性基础上建立起的两种国际社会的内部构架准则不同,但整体上来说二者均属欧洲体系,只不过一种建立在对外开放的原则基础上,而另一种则建立在封闭的、防御的、贯穿意识形态的保护性的原则基础上。

这样就形成了欧洲体系的两种变体,这两种变体各自的中心却是欧洲以外的苏联与美国,而且两种变体构架的内部准则(即集权化与分权化)截然不同。形式上存在统一的国际社会和统一的国际体系,但实际上它们却

^①虽然一些研究者正确地指出,在希腊、罗马和原欧洲传统中存在对世界统一性有价值的理解。比如:Барабанов О. Н. Истори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Эпоха Древнего мира. М.: МГИМО (У) МИД России, 2007.

被划分成两个完全对立的大区域子体系。在军事上大致取得平衡后,边缘国家的非殖民化成为了时代的关键所在,因为它会加强或削弱(“多米诺骨牌”效应)两极中的某一极。因此,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共同鼓励非殖民化进程的发展。

这时爆发了不结盟运动,也就是“第三条路”的方案被提了出来。那些不希望融入任何一极的国家纷纷开始选择这条道路。它们因某些原因不满足于被两极国家所掌控,也不愿因此被世界分级排序及对构建严格的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当时的术语是西方或东方)的现代化进行选择。这种趋势的表现之一是中国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这时形成的发展模式还有现代反霸权主义工业与后工业发展模式,东方进入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政治现代化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某些非西方国家(包括东方国家)创建了开放的社会政治体系,这使得它们能够避免体系危机,并在经济上赶上西方国家,同时还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特点。而另一些非西方国家暂时还无法走出“动员——稳定——停滞——危机”这一周期循环。^[1]

两极体系瓦解后,世界政治格局出现两种基本趋势——领袖格局和多中心格局。但同时还出现了积极模仿旧体制的浪潮。这种趋势是在严格的等级性与传统性的原则上,传承19世纪下半叶前还存在的古老的非欧区域模式,这些模式未曾被国际法在法律上认同。这种影子中心有的是自然形成的,有的是有目的地创建的,包括使用强制手段效仿两极体系瓦解后,形成于过渡阶段的世界格局模式,因为效仿的模式本是存在于旧时的自然社会秩序中的,所以其无法适应全球化所带来的剧变。

旧的经济结构模式实际上在20世纪末完全消失。因此其他一些虽采用市场经济竞争基本模式,却在其中融入本国特点的非西方国家制定了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方案,并在某些领域开始赶上世界体系中的领先国家(即“追赶式”发展模式)。有一些非西方国家创建了开放式的区域性体系后,向其中注入本国的文化元素与特色(如日本,韩国,巴西,新加坡),甚

至尝试推翻西方后工业发展的模式。出现了一些威权政治统治的国家或地区,它们经济上有部分的自由性,但同时因不同原因与情况社会政治领域的自主性受到限制或控制(如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这种模式在具体的历史阶段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但有些国家却绕过这种模式朝前发展。^①即使在起步阶段或者在有如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或柯西金经济改革时期的某个阶段间,这种模式都会很快引起中国^[5]和少数威权主义亚洲国家(如越南与拉劳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的古巴)的经济飞跃。但西方国家同样也怀疑这种模式是否会成功,因为非西方国家发展的下一阶段究竟如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一问题今天对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世界体系中经济与政治正在崛起的国家来说,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其他没能够形成哪怕是民族性的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发展开始滞后。这就推动了世界体系运行的新准则产生。这些准则应在经济结构转变后产生,因为只有过渡到新结构才有可能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重新制定世界体系的规则,而不用考虑所有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的利益。此外,部分发展成绩不好的参与国及其政治精英们希望摧毁现存体系,或者遵循旧体系结构准则。既没有加入新格局,也没有加入现有政治经济结构(“成绩不好”的发展模式)的那些国家,这种愿望尤为强烈。在旧结构终结、新技术经济结构形成的阶段,政治经济空间分布新模式的原型开始出现。这些原型虽然受到各种好评,但暂时还没有最终确立。在向新政治经济秩序和新科技结构演变的过渡时期,世界好像电脑一般“死机”了。正在进行一体化的西方出现了混乱,究其原因主要是二十年来的不断扩张及过速发展带来的超负荷,过度自由的民主模式下的西方精英们没有能力在极短时间内,用“熔化锅”或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将受他国文化和政治观念与价值观教育的来自边缘地带的移民“消化”^[6],以及解决世界财政平衡失调的问题。在东方,

^①详见: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и модели демократии на Востоке.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9.

不具竞争力的绝对极权模式(如 2011 年的北非事件)开始消失。东方被分成几个不相关联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政治发展困难的非洲;因内部矛盾四分五裂,难以进行一体化,整体上又固步自封^[7]的以基本一致的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主义)为联结基础的近东国家;军事安全与暴力冲突为首要问题的东北亚地区,该地区为“中心领导体制”,其周围是几个拥有其自身区域制度与一体化进程方案的地区性大国;遵循协议准则大力推行一体化的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

拉丁美洲国家整体上采取了现代政治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但其政治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由其经济上的高度两极分化决定。这种两极分化阻碍了政治稳定发展的进程,并令左派政党的运动更为凸显。但与此同时,这种两极分化也并没有给类似巴西这类国家的发展态势与民主政治体系模式的形成带来影响。

东亚地区一体化趋势总体上在不断增强^[8],而这一地区本身正在逐步变为世界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这一地区政治经济空间区域配置及全球治理新布局的新型模式的诸多样式已经固定并开始成形,虽然暂时还没有最终成型,但是俄罗斯与中国已经对参与新模式的形成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地区目前还是处于一分为二的状态:一部分地区安全性问题居首位,安全状况的激化成为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调控器,对未来的冲突有着残酷而现实的预见;另一部分地区正在发展经济一体化与高端技术合作。如:

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仍然重于经济发展问题。那里形成了以美国及一些强国(如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为首的多中心体系,这些国家之间基本还存在着实际的竞争(如军事平衡与潜在的军事冲突)。在东北亚,每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地区强国都推行本地区的制度方案,这些方案在许多标准上互相矛盾;东北亚存在拥有核武器的“问题国家”北朝鲜,东北亚一体化经济模式的发展已基本停滞,或者说发展得不好,因为现代社会从未有过政治模式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经济却协同发展的国家。

在东南亚已经形成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为

中心的合作模式。因为缺少优势明显的核心,东南亚的模式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与彼此互补的,它们走协定的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道路,也就是说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占优,经济关系、多方经济合作、创新经济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出现了增长三角、自由经济区域、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议等自由贸易的发展产物。这种模式显示了参与国的经济可稳定发展,甚至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期参与国的经济也可以保持增长,而政治的特性并不意味着阻碍理顺各类折衷的文明和宗教信仰的特殊性,没有妥协合作式的协同发展就无从谈起。同时可以发现,区域开始扩张,尤其是经济危机时期扩张的潜力更为显著。东盟国家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的贸易协定见证了积极扩张与创建大区域的全过程,但同时,美中两国间显现了两极对峙僵硬格局新一轮周期循环的可能性,这可令整个大区域,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对峙的局面中。

对俄中而言,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是不要被卷入地缘政治格局中,这会“冻结”两国对内政策与经济发展,与具备更高创新技术水平的国家相对立,以及切断与世界主要的开放式的社会经济一体化模式的联系,而世界区域政治经济空间相互依赖与关联的新性质就是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将失去投入到经济、社会和技术革新发展的区域和全球资源的使用机会,并被迫加大用来对抗居优势的军事联盟以维护军事均势以及在意识形态上保障新的闭关锁国的所需开支。陈旧的现实主义的国际秩序模式中的军事均势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抛到一边并阻碍俄罗斯“维护”人民这一任务(弗·普京)及俄中两国现代化的实现。也就是说,俄中两国长期的共同任务是尽量减少相互关联的欧洲与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空间之间的差距,这里强调的是建设性的渐进的“共同性”,而非“对立性”或“特殊性”。此外,还应当拓宽俄中两国统一的、互联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协定空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最大程度地把俄中两国吸纳到这一正

在形成的跨国空间中来。而俄罗斯国内政治任务则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国家和社会政治秩序的高效性和开放性,这可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俄罗斯与欧洲—大西洋及太平洋地区的相互联系,而又不附有现代俄罗斯政治文化中常见的保守的传统的特征。

世界区域学作为一门学科研究的是如何管理统一的,同时又是有差别的世界区域空间(全球政治空间与时间的社会工程)的手段和方法。世界区域学专家和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面临的的就是如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完成这个政治经济任务。然而这一任务要求培养与过去相比对世界进程更为了解的政治精英。这些新专家除应在外国进修一些必要的课程外,还应拥有多国共同承认的文凭或国际公认的高等学府的毕业证书。原则上,他们应具有一所大学的学士学位,另一所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最好在另一个培养体系的学校(可以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大学,也可以是金砖国家的大学)用外语研修联合办学课程。所有成功国家的经验显示,只有在实践中领会比较分析方法的特点,并在他国的文化历史与社会经济的生活方式中通过居住、学习及专业活动将其融会贯通的专家,才真正具备竞争力。在当今发展模式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这些专家能够针对问题提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这不仅单靠他们具有在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学所学到的知识,还凭借他们自身在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现实中的实践经验。现实中,他们的竞争力也证实了他们的个人智力潜能与专业素质。从欧洲开始,处于上升趋势的国家都采用了这种具有真正竞争力的精英的培养模式。美国、日本、一些新工业国家、韩国和当今的中国与中亚国家也纷纷采用这种培养模式。当今环境下俄罗斯与世界的联系,俄罗斯对世界的“融入度”,俄罗斯参与建立“互联空间”的可能性只能通过大量的上述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来保障,也就是需要通过“垄断国际化”相对立的“责任国际化”进程,而非通过“精英民族化”来实现。“精英民族化”最终会导致最积极的文化水平最高的

区域的精英和(或)内部外部移民的退化。金砖国家联盟的创建及成员国的协同发展——这是实现成员国共同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同时,也是让新一代人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美好的世界里生活的契机。

参考文献

- [1]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 (Отв. ред.). Восток и политика.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9.
- [2] Watson A.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 N. Y.: Routledge, 1992.
- [3] Pomeranz, K.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Норт Д., Уоллис Д., Вайнгаст Б. Насил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порядки.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е рамки дл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письм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ститута Гайдара, 2011.
- [4] Васильев Л. С.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в 6 томах.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жный д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2, т.6.
- [5] Шуду Чжунго Саньшинянь (Китай в цифрах за 30 лет). Пекин: Шэхуэй кэсюэ вэньсянь чубаньшэ, 2008; Чжунго 2020: Фачжань мубяо хэ чжэнцэ сюсян (Китай 2020: ц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курса). Под ред. Чжан Юйтая. Пекин: Чжунго фачжань чубаньшэ, 2008.
- [6] E-Naroui, H. Reinventer L' Occident. Essai Sur Une Crise Economique. Paris: Flammarion, 2010.
- [7]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арабское пробуждение и Россия: что дальше? М.: 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2012.
- [8]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 Д. «Больш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М.: Факультет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2006; «Большая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 Под ред. 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ого. М.: МГИМО-Университет, 2010.

(作者为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比较政治学》杂志主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主任研究员,教授。译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